

本土市场需求、国内价值链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基于 1981-2008 年中国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

杜宇玮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区域发展研究中心)

摘要: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关键是要依托本土市场需求来转变出口增长方式。文章从国内价值链视角,基于 1981-2008 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实证研究了本土市场需求对不同贸易方式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巨大的本土市场需求规模、高端市场需求容量、客观存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市场需求特征都有利于中国的国内价值链构建和贸易方式转型,其中本土高端市场需求容量是重要决定因素;此外,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道路还受到国际市场状况、汇率波动以及本国开放战略和政策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

关键词: 本土市场需求; 全球价值链; 国内价值链; 加工贸易; 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 F015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在过去 30 多年中,中国制造业主要是以贴牌代工或加工贸易的方式,融入到由发达国家与部分新兴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所主导的俘获型全球价值链(GVC)中,这种外向型经济产业发展模式缔造了国民经济连续 30 年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但是,在“贸易大国”和“经济大国”的耀眼光环下,这种具有“飞地”特征的开放经济模式发展也带来了经济虚高增长、产业结构二元化、收入分配及地区差距增大、能源紧缺、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发展。而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加工贸易在全球经济衰退和需求下行的形势下增速趋缓甚至逆转为负增长,这对东部沿海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增长、就业状况、财政收入甚至社会稳定都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应。毋庸置疑,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已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问题之一。

目前关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研究主要包括两类:一类主要围绕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方向展开,侧重在加工贸易本身范畴内探讨转型升级的路径与策略(张蕴如, 2001; 廖涵, 2003; 王子先等, 2004; 隆国强, 2006; 裴长洪, 2008); 另一类则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分析了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认为在全球生产网络内分工模式下,加工贸易升级主要表现为加工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地位及其所从事价值链环节的提升,其核心是企业能力的提高,加工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是加工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江苏制造业攀升价值链高端的对策研究”(编号: 11EYC018)

贸易转型升级的决定性因素（刘德学等，2006；闫国庆等，2009；许南和李建军，2010）。这两类研究是侧重从开放条件下的产业升级和企业战略角度分析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未能将其置于中国特殊的“大国条件”下进行考察。

实际上，中国在加工贸易模式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上，既不能脱离全球化背景，也不能忽视本国国情，必须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潜力很大的社会主义大国，无论从意识形态、国际环境、资源禀赋、市场容量及产业结构水平来看，都不可能像日、韩那样采取单一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来摆脱加工贸易；另一方面，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的潜力指标、企业微观基础以及对外经济条件等因素，当前采取“内需主导型”发展模式的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洪联英和刘解龙，2009），简单地定位于从外需转向内需的策略，也会使中国已经形成的外向化发展格局发生严重的倒退，使中国的企业和产业遭受严重损失，并使中国再次与世界发展主流隔离（刘志彪，2010）。

然而，这不排除可以立足本土市场需求来发展出口贸易，因为根据“本地市场效应”理论，一国内需市场的稳定和扩大所带来的规模化生产和生产率提高能够促进出口（Krugman, 1980）。Schmitz（2004）通过总结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践经验后也发现，凭借国内市场发育而成，然后进入区域或全球市场的价值链分工生产体系中的本土企业或网络，表现出很强的功能升级与链条升级能力。这些基于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 NVC）的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或网络首先专注于国内市场的开拓与竞争，在取得国内市场某个行业或产品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竞争优势后，就建立起自己设计、品牌和全国销售渠道（刘志彪和张杰，2007）。而且在国内价值链构建的过程中，通过企业前后向关联形成的产业集群，增加了中间产品的种类和数量，扩大了中间产品的需求，从而对于加工贸易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罗建兵，2010）。

因此本文认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根本出路可能在于，立足快速增长的本土市场需求空间，发挥本土市场优势，以内需促外需，实施内外需均衡战略，通过转变出口增长方式来保持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基于此，在前人相关研究基础上，本文试图立足中国现实，从国内价值链视角，就本土市场需求对专业化分工与贸易模式转变的作用进行实证研究，以反映通过发挥本土市场需求效应构建国内价值链来实现加工贸易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可能性，从而为国内价值链的构建提供经验证据和可行路径。这是本文的目的，也是本文与现有研究的不同之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理论上阐释本土市场需求与国内价值链构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内在作用机理，进而提出待检验假说；第三部分运用1981~2008年的时间序列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实证估计并比较本土市场需求因素及其它外部因素对不同贸易方式出口的影响；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基本假说

波特（Porter, 1990）认为，本土市场需求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可以从本土市场的性质、本土市场的容量及其成长速度、本土市场需求转化为国际市场需求的的能力等方面来考察。

本文认为，本土市场需求不仅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提高创新活动的预期利润，而且还可能通过由需求水平的横向差异所引致的分工效应降低生产与创新成本，从而提升产业效率。因此，本土市场需求的规模和容量、市场需求水平以及市场需求的区域不平衡等方面可能构成了企业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动力。国内价值链正是基于国内本土市场需求发育而成，由本土企业掌握产品价值链的核心环节，在本土市场获得品牌和销售终端渠道以及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的产品链高端竞争力，然后进入区域或全球市场的价值链分工生产体系（刘志彪和张杰，2009）。因此，能否立足本土市场需求，借力“本地市场效应”，通过构建国内价值链实现外源性升级，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

首先，本土市场需求的规模和容量是构建国内价值链的决定因素。市场需求规模的增加，对一国技术创新在短期内具有需求拉动效应，在长期则有供给推动效应，一国市场需求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研发投入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范红忠，2007）。因为一方面，巨大且快速成长的国内市场规模可以容纳更多条不同的价值链，为专业化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根据垄断竞争模型的特点，市场容量的扩张为企业创建自主品牌提供了基础，使得本土企业可以在更广阔的产品空间内避免与跨国公司的强势品牌进行直接竞争，从而有利于本土领导型企业的形成与发展。

假说 1：本土市场需求规模大小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具有正向影响，市场需求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国内价值链构建，从而越能摆脱对加工贸易的依赖。

其次，本土市场需求的水平是影响国内价值链构建的关键因素。波特的钻石模型表明，具有挑剔客户的市场需求（主要指本土市场需求）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要素之一。当一国的本土消费者对某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十分挑剔，且比其他国家客户的要求更高时，该国企业就会尽力生产出技术水平较高、质量较好的产品，因而企业就有更多的改进和创新产品的压力，从而提升整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种“挑剔效应”在市场竞争比较激烈时更为明显，而这取决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或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与自主品牌的国内价值链的构建，离不开较大规模中高端本土市场需求的支撑，中高端市场的容量是决定一国的产业或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与自主品牌能否培育而成的关键因素。

假说 2：本土市场需求水平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可能性正相关，本土市场需求水平越高，高端市场需求容量越大，越能促进国内价值链的形成。

再次，本土市场需求的区域不平衡是构建国内价值链的重要条件。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各国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化，使得大多数国家都逐渐融入到统一的世界市场中，为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规模兴起提供了机遇。以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大陆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自己专注于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端环节，从而完成了代工超越。与全球价值链相同，一条完整的国内价值链必然由包含不同附加值、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各个价值链环节构成，这需要由具有不同要素禀赋与发展水平的地区和产业来共同构建。

假说 3：本土市场需求的区域不平衡程度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具有正向效应，地区差距越大，国内价值链越容易构建。

三、计量检验及其结果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从宏观层面看，加工贸易额特别是加工贸易出口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深度。相对地，一般贸易往往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的最后环节，反映了对外贸易生产者全部的生产要素禀赋；从事一般贸易出口的企业扎根于本土，其增值过程基本在特定国家或经济体内部完成。因此，与加工贸易出口相对应，一般贸易出口可以反映国内价值链的形成状况：一般贸易出口额越大，国内价值链越完善，从而越有益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基于此，我们设定以下计量回归模型来检验以上理论假说：

$$EX = f(SIZE, LEVEL, REGION, CONTROL) \quad (1)$$

其中 EX 代表一般贸易或加工贸易出口额， $SIZE$ 和 $LEVEL$ 分别表示市场需求规模和水平， $REGION$ 表示市场需求的区域不平衡状况， $CONTROL$ 则代表控制变量，其主要包括国内外市场环境及政策制度因素等。各回归变量选取如下：

1. 出口变量。选取 1981~2008 年间的全国一般贸易或加工贸易的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出口额（分别为 OEX 和 AEX ）作为被解释变量。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没有采用出口贸易量（按不变价格计算的贸易额）的理由是：其一，根据行为经济学理论，人们在进行消费、投资时都会存在心理账户和忽略数字的心理，这使得人们在消费和投资时不大考虑通货膨胀或者物价的因素，而仅仅考虑历史上的消费、投资、收入、进出口等账面数字。在这种行为惯性下，对数据进行剔除物价因素的处理反而可能会扭曲相关信息（孙楚仁等，2006）。其二，有些研究用消费者价格指数对出口值进行不变价格的实际值折算，但根据贸易量的定义，需要以固定年份为基期而确定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去除报告期的进出口额而得出的，因而按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物价剔除显然不合理。而囿于出口指数的不全，很难求得各年份的出口量。同样地，对于后文的宏观变量，若无特别说明，也均未剔除物价因素。

2. 市场需求规模变量。学术界对市场需求规模的衡量通常用 GDP （Carr et al., 2001）、人均 GDP （Ades and Glaeser, 1999）、进出口规模与 GDP 的比值表示的开放度（Alesina et al., 2004）等。严格来讲，市场需求规模大小是由具有购买欲望且有支付能力，同时能接近商品的潜在购买者决定的。潜在购买者越多，市场需求规模就越大。而潜在购买者的多少取决于人口状况，特别是人口数量的变化对潜在购买者和市场需求规模产生直接影响。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说明了消费者和潜在购买者群体的庞大，从而刺激了中国市场的发展壮大。当然，在一国经济规模水平及其成长速度比较低的情况下，人口众多可能导致贫困从而降低该国的有效需求规模。然而，对中国而言，在经济总量巨大且收入支出水平增长迅速的

条件下，人口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了本土消费市场具有难以估量的发展潜力^①；同时为降低与其它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所以选取大陆历年年末总人口数（POP）来衡量本土市场需求规模和容量。

3. 市场需求水平变量。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较大程度上代表了我国本土市场需求的高端水平。2009 年长三角地区 GDP 总量达到 72494.1 亿元，占全国的 21.3%；珠三角 GDP 总量约为 32105.9 亿元，占 9.4%；两个地区的人均 GDP 分别达到 48897 元和 40966 元，表明两大地区已基本迈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因而这里选取东部地区 GDP 总量（EGDP）来反映构建国内价值链所需的高端市场需求容量大小。

4. 市场需求的区域不平衡变量。测度区域不平衡或地区差距的方法有很多，如基尼系数法、泰尔（Theil）指数法、变异系数法、普通熵（GE）指数法等。其中泰尔指数的特殊意义在于该指标能将总体的区域差异分解成不同空间尺度的内部差异和外部差异，如中国的区域差异可以分解成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地带内差异和地带间差距（刘慧，2006）。泰尔指数的基本计算公式如下：

$$Theil_t = \sum_i \sum_j \left(\frac{Y_{ij}}{Y} \right) \ln \left(\frac{Y_{ij}/Y}{P_{ij}/P} \right) \quad (2)$$

进一步地，可分解为区域间泰尔指数 $Theil_{inter}$ 和区域内泰尔指数 $Theil_{intra}$ ，其中 $Theil_{intra}$ 为区域内各省份间收入差距按该区域 GDP 所占全国比重的加权和：

$$Theil_t = Theil_{inter} + Theil_{intra} \quad (3)$$

$$Theil_{inter} = \sum_i \left(\frac{Y_i}{Y} \right) \ln \left(\frac{Y_i/Y}{P_i/P} \right) \quad (4)$$

$$Theil_{intra} = \sum_i \left(\frac{Y_i}{Y} \right) \times Theil_{prov} = \sum_i \left(\frac{Y_i}{Y} \right) \times \sum_j \left(\frac{Y_{ij}}{Y_i} \right) \ln \left(\frac{Y_{ij}/Y_i}{P_{ij}/P_i} \right) \quad (5)$$

一般地，我们将中国经济区分为东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并采用 GDP 指标的总泰尔指数（THEIL）来测算中国地区差距，用以反映市场需求的区域不平衡状况。

5. 控制变量。首先，从出口的外部因素来看，在进口国消费者偏好同质性假设下，一国的出口需求是进口国实际收入水平、出口商品相对价格的函数。由于中国的出口贸易伙伴国大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因而对于进口国的实际收入，本文采用 OECD 国家的年度国内制造业生产指数（IP）来近似代替。众所周知，汇率作为一种相对价格，是影响出口的重要因素。因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资本项目具有较大的调节作用，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① 到 2009 年末，中国人口总数达到 133474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 62186 万，农村人口为 71288 万。从消费规模来看，2009 年，城镇和农村人均消费性支出分别达到 2182.12 元和 826.31 元；与 1978 年相比，分别增长了 1870.92 元和 710.25 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6.48% 和 6.54%。这些数据是以 1978 年为基期进行折算后的实际人均消费支出，其中农村数据为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REER)对贸易收支的调节作用较大(李亚新和余明, 2002), 所以这里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来度量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 其上升表示人民币的实际升值。

其次, 对于一般贸易出口来说, 除了上述外部因素外, 加工贸易发展可能带来双重效应: 加工贸易出口产生的“挤出效应”和加工贸易进口带来的“促进效应”(朱启荣, 2007)。故而, 我们将加工贸易进出口(分别为 AIM 和 AEX)引入一般贸易出口的控制变量。而对于加工贸易出口来说, 产品内分工背景下的“为出口而进口”机制体现了加工贸易进口的重要支撑作用, 所以将加工贸易进口作为加工贸易出口的控制变量之一。

再次, 中国东部地区加工贸易的主体是跨国公司通过 FDI 所形成的外资企业, 这使得中国加工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资企业引导和推动的, 因此 FDI 应该是加工贸易出口的重要原因之一。考虑到 FDI 的滞后效应, 这里采用上一年的外商直接投资额 (FDI_{t-1}) 作为影响加工贸易出口的控制变量之一。此外, 鉴于 1992 年是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临界点, 故设定虚拟变量 D1, 1981~1992 年取值为 0, 1992~2008 年取值为 1, 表明政策的变化。

本研究主要以 1981~2008 年时间序列数据的指标为基础进行分析。其中一般贸易出口和加工贸易数据来源于国研网, 全国人口数据取自 2010 年《中国统计年鉴》, 各地区的 GDP 和人口数以及 FDI 值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 OECD 国家的 IP 指数(以 2005 年为基期)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REER 则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BIS)。

为有效消除模型的异方差问题, 对模型中各变量取自然对数形式, 从而得到以下计量模型:

$$\ln(OEX_t) = \alpha + \ln(POP_t) + \ln(EGDP_t) + \ln(THEIL_t) + \ln(REER_t) + \ln(IP_t) + \ln(AEX_t) + \ln(AIM_t) + \mu_t \quad (6)$$

$$\ln(AEX_t) = c + \ln(POP_t) + \ln(EGDP_t) + \ln(THEIL_t) + \ln(REER_t) + \ln(IP_t) + \ln(AIM_t) + \ln(FDI_{t-1}) + D1_t + \varepsilon_t \quad (7)$$

(二)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由于宏观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往往都不是平稳的, 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 需要对各变量的样本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见表 1)。经检验, 各变量数据均满足 I(1) 过程, 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下面运用 Engle-Granger 检验方法对各模型回归后的残差进行协整关系的检验(见表 2), 结果表明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接着, 通过对一般贸易出口及加工贸易出口的各影响系数分别进行 OLS 回归估计后, 可以得到如表 3 所示的结果。通过比较分析, 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 巨大的本土市场需求规模有利于国内价值链形成与发展, 从而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具有积极影响。回归结果显示, 以人口规模表示的市场需求容量虽然对一般贸易出口不存在显著影响, 但与加工贸易出口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且成为影响加工贸易出口的最重要影响因素。这表明当前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尚不能有效促进国内价值链的构建, 其原因可能在于, 虽然人口规模庞大, 但高层次和创新型人才明显不足, 教育和科技投入

整体不足，人均收入水平不够高导致有效需求规模不足，极大影响着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据统计，我国 15 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比 OECD 国家低 3 年以上，而且从业人员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 7.2% 左右，明显低于 2000 年 12.6% 的世界平均水平。从城镇从业人员结构来看，技能劳动者仅占 32.9%，其中技师和高级技师只占 4%。这也暗示了从市场需求规模来看，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实施“内需主导型”大国发展模式的内生条件。然而，人口规模越大，加工贸易出口越受限制，其相关系数为-14.2310，显然大于其它变量的估计系数。这表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这个高速发展的人口大国所蕴含的市场潜力已初步发挥出本土市场效应，这意味着扩大本土市场能够降低中国出口对加工贸易的依赖（邱斌和尹威，2010）。

第二，本土高端市场需求容量是中国出口的重要决定因素，并在较大程度上决定着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成败。从模型 1-3 中看到，在逐渐加入控制变量后，东部地区的 GDP 规模与一般贸易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这一方面说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高端市场需求容量确实是构建国内价值链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另一方面，相对于其它市场需求变量而言，本土市场需求水平高低对国内价值链形成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此外，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本土市场规模对国内价值链构建的积极作用。同样地，东部地区 GDP 与加工贸易出口之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表明，本土市场需求水平的提高确实能够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2009 年长三角地区 GDP 总量达到 72494.1 亿元，占全国的 21.3%；珠三角 GDP 总量约为 32105.9 亿元，占 9.4%；两个地区的人均 GDP 分别达到 48897 元和 40966 元，表明两大地区已基本迈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另外据统计，2009 年全国各大地区中，上海以 78905.19 元的人均 GDP 居首，北京人均 GDP 为 70005.31 元，天津为 63782.31 元。接下来是浙江、江苏、广东、内蒙古、山东、辽宁、福建，这 7 个地区人均 GDP 已经超过了 4000 美元，这意味着我国有十个省市已经进入了中等发达地区门槛。因而，可以说中国已具备构建国内价值链所需的高端市场需求容量。

第三，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显著影响了出口发展，从而也成为影响国内价值链构建的因素之一。无论是对一般贸易出口或是加工贸易出口来说，以泰尔指数表示的中国地区差距都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解释了当前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与加工贸易发展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一方面，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是建立在中西部地区作为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低级要素供应者的基础之上的，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和政策偏向等因素所形成的区域优势吸引了中西部要素资源的纷纷流入，成为其加工贸易和贴牌代工产业发展的强大后盾；另一方面，由于东部地区对“世界加工厂”的低端定位，割裂了产业在地区间的技术经济关联效应，使中西部地区沦为纯粹的原材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供应地，抑制了中西部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间和可能性，从而导致中西部地区在增长的相对位势上发生了普遍的“塌陷”（刘志彪和张少军，2008）。

不过应该看到的是，这种地区经济差距与市场需求不平衡状况的客观存在也恰恰为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了条件。随着东部沿海地区要素成本与商务成本的不断上升，当

地的加工贸易产业面临着产业外移的局面，中西部地区可以充分自身在要素禀赋方面的成本优势，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代工环节转移，取得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的空间。同时，这种较低代价的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也能减缓东部地区要素成本的上升速度，减少产业升级的难度，从而为其从制造基地向总部基地转型创造足够的时间和有利条件。我们采用基于GDP指标测算的泰尔指数来反映了中国地区差距，结果发现，自1992年以来，中国地区差距的总泰尔指数总体上以2003年为拐点，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总体上仍处于较高的水平（如图1所示）。从其结构分解来看，区域间（东部沿海与内陆地区之间）泰尔指数对总体泰尔指数的贡献率较高，年平均达65.6%，说明区域间差距在中国地区差距中占有重要地位^②。我国客观存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使得东部发达地区与内陆欠发达地区之间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成为可能，从而为构建国内价值链进而促进区域间产业互补、协调发展提供了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将模型中的泰尔指数替换为其平方形式后再进行回归后发现，泰尔指数平方项与一般贸易或加工贸易出口之间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即地区差距与出口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这说明纵然适当的地区差距有助于中国出口发展与产业升级，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过度失衡不仅会对要素的流动和效率产生严重影响，从而弱化产业国际竞争力，而且也将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障碍。

表1 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变量	检验类型	1%临界值	5%临界值	10%临界值	ADF值	平稳性
lnOEX	(C 0 0)	-3.6999	-2.9763	-2.6274	-0.0010	不平稳
△lnOEX	(C 0 0)	-3.7115	-2.9810	-2.6299	-5.8013***	平稳
lnAEX	(C T 0)	-4.3393	-3.5875	-3.2292	-2.6397	不平稳
△lnAEX	(C T 0)	-4.3561	-3.5950	-3.2335	-16.667***	平稳
lnAIM	(C T 0)	-4.3393	-3.5875	-3.2292	-1.9140	不平稳
△lnAIM	(C T 0)	-4.3561	-3.5950	-3.2335	-15.0408***	平稳
lnPOP	(C 0 0)	-3.6999	-2.9763	-2.6274	-12.3446***	平稳
△lnPOP	(C 0 9)	-3.8868	-3.0522	-2.6666	-5.1225***	平稳
lnEGDP	(C 0 2)	-3.7241	-2.9862	-2.6326	-1.0431	不平稳
△lnEGDP	(C 0 1)	-3.7241	-2.9862	-2.6326	-3.3098**	平稳
lnTHEIL	(C T 0)	-4.3393	-3.5875	-3.2292	-2.2454	不平稳
△lnTHEIL	(C T 0)	-4.3561	-3.5950	-3.2335	-4.7144***	平稳
lnIP	(C 0 0)	-3.6999	-2.9763	-2.6274	-3.7487***	平稳
△lnIP	(C 0 0)	-3.7115	-2.9810	-2.6299	-3.1780**	平稳
lnREER	(C T 0)	-4.3393	-3.5875	-3.2292	-1.3978	不平稳
△lnREER	(C T 1)	-4.3743	-3.6032	-3.2381	-4.6262***	平稳
lnFDI	(C 0 0)	-3.7115	-2.9810	-2.6299	-1.8617	不平稳
△lnFDI	(C 0 0)	-3.7115	-2.9810	-2.6299	-2.9928**	平稳
D1	(C 0 0)	-3.6999	-2.9763	-2.6274	-1.2172	不平稳

^② 泰尔指数有个缺点，即分组的结构不同，测出的数值可能不同，且分组越细，得出的数值越大。因此，本文所测算出泰尔指数可能与其它研究的结果有所差异，但这并不妨碍基于时间维度的纵向对比。

$\Delta D1$	(C T 0)	-3.7115	-2.9810	-2.6299	-5.0990***	平稳
-------------	---------	---------	---------	---------	------------	----

注：检验类型中依次表示为是否有常数项、趋势项以及滞后阶数，其中滞后阶数根据 AIC 和 SZ 准则选取。
*表示通过 10%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示通过 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示通过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 2 Engle-Granger 协整检验

样本	检验类型	1%临界值	5%临界值	10%临界值	ADF 值	平稳性
模型 1	(C T 4)	-4.4163	-3.6220	-3.2486	-4.4260***	平稳
模型 2	(C T 2)	-4.3943	-3.6121	-3.2431	-3.5602*	平稳

注：其中*表示通过 10%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示通过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 3 本土市场需求及外部条件对不同贸易方式出口的影响系数估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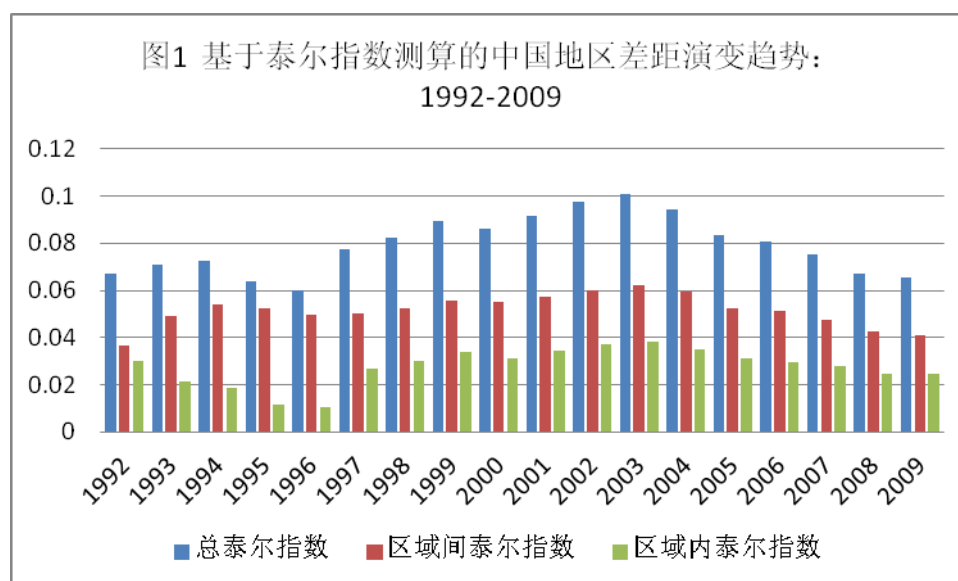
解释变量	一般贸易出口 (OEX)			加工贸易出口 (AEX)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c	68.9100 (1.0075)	182.2734 (1.2038)	134.9857 (0.6067)	145.5019** (2.1248)
POP	-6.3944 (-1.0487)	-16.9368 (-1.2785)	-13.0001 (-0.6773)	-14.2310** (-2.2635)
EGDP	1.4450*** (4.1590)	1.2173*** (3.9134)	0.7621* (1.9393)	-1.0035*** (-8.3190)
THEIL	0.1854 (0.3968)	0.3769* (1.7515)	0.4156* (1.9486)	0.5076* (1.9578)
REER		-1.3354*** (-6.9044)	-1.0385*** (-3.9064)	0.5400** (2.3121)
IP		4.3391*** (2.9536)	4.9253*** (3.3252)	6.1910*** (3.8030)
AEX			-0.3702* (-1.8518)	
AIM			0.6163* (1.7433)	1.3733*** (16.1651)
FDI				0.1028* (1.9546)
D1				0.2618*** (3.1368)
ar(1)	0.5697** (2.3447)	0.8694 *** (6.1758)	0.8759*** (5.8193)	-0.4896*** (-3.7467)
AD-R ² 值	0.9885	0.9960	0.9964	0.9988
D-W 值	2.0245	2.6239	2.6426	2.1556
F 统计量	560.7172	1078.4280	900.7950	2421.5980

注：括号内为 t 值，其中***表示通过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示通过 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示通过 10%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未带*表示未通过 10%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第四，国外需求状况及国际市场竞争程度对中国出口贸易发展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但不能显著促进出口增长方式转型。从控制变量来看，外部因素也是出口的重要影响因素，

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基本符合（章艳红，2009；郭晶和洪诗茜，2010）。但有所不同的是，本文研究结果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一般贸易出口与加工贸易出口分别具有负向和正向影响。这说明中国一般贸易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价格优势，所以人民币实际升值使得出口商品相对价格上升，从而可能会削弱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人民币升值非但不能充分发挥其“倒逼效应”，而且还可能进一步激发本土企业购买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机器设备而忽视自主创新和本土装备制造制造业的发展，从而强化对加工贸易模式的依赖。

第五，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之路也受到加工贸易本身发展程度、外资规模及开放政策的影响。从模型3中可以发现，加工贸易出口与一般贸易出口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加工贸易进口则显著促进了一般贸易出口的发展。前者在一定程度上恰好支持了本文对被解释变量的选取；而对于后者，以外资企业为主体的加工贸易企业的进口品基本上是我国较为稀缺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其可能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提升了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此外，现行的政策还促进了国产中间品复进口的迅速增长，这也带动了一般贸易出口的增长。模型4则还证实了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以来，中国特殊的外资政策以及出口导向型战略的深入是促进加工贸易出口飞速发展的重要政策变量。



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内陆地区是指除东部沿海地区之外的20个省、市、自治区；由于重庆市在1997年才建立直辖市，为统一数据口径，这里将重庆合并入四川。

资料来源：根据中经网数据计算绘制。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构建与全球价值链并行的、相对独立的国内价值链，并促进两者平衡与协调发展，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破解“增长与升级”的两难问题、实现产业升级并最终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必要途径。同样，对于拥有巨大本土市场以及消费结构不断高级化的中国来说，在融入

GVC 的基础上另辟蹊径构建国内价值链的战略,由外需依赖转化为以内外需并重,依托本土市场创建自主品牌,然后嵌入 GVC,应该是全球化背景下突破结构封锁、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选择。

本文基于 1981~2008 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研究了本土市场需求对不同贸易方式出口的影响,从而解释了本土市场需求条件及其它外部因素对国内价值链构建以及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程度及其长期关系。我们将贸易方式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并根据中国现实分别建立回归模型,进而通过比较分析得到以下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一,中国巨大的本土市场需求规模、高端市场需求容量、客观存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都有利于国内价值链形成与发展,从而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具有积极影响,特别是本土高端市场需求容量是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通过发挥本土市场需求效应来构建国内价值链可能是中国制造业实现代工超越的现实路径。对于中国本土企业而言,应当利用高速增长和多样化的本土市场需求空间特别是高端需求空间来培育和发展自主创新能力、自主品牌与销售终端渠道控制能力等高端竞争优势,才能具备与外资企业、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乃至全球市场上抗衡的竞争能力。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应从竞争政策、信贷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等多方面加大扩大内需的政策扶持力度,鼓励和加大人力资本投入,积极培育国内中高端需求,消除国内市场分割,为国内价值链的构建提供良好的市场条件。

第二,国外需求状况及国际市场竞争程度对中国出口贸易发展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其中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一般贸易出口与加工贸易出口分别具有负向和正向影响。因此,人民币升值可能会削弱中国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商品的出口竞争力,而且其“倒逼效应”可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反而强化对加工贸易模式的依赖。因此,在出口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人民币可适当放宽升值幅度,但不能够大幅度升值,以避免过度削弱我国自主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第三,加工贸易本身发展程度、外资规模及开放战略和政策也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具有一定影响。其中,加工贸易出口与一般贸易出口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加工贸易进口则显著促进了一般贸易出口的发展。因而,短期内促进我国加工贸易商品结构与技术结构升级,增强其加工贸易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实现代工超越长期目标的一种可行之策。另外,外资引进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与调整也是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过程中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

因此,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之路并不会一帆风顺,也不能一蹴而就的。在纷纭复杂的开放环境中,政府和企业都需要与时俱进,审时度势,扬长避短,利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战略调整机遇,依托本土市场需求,努力构建国内价值链,选择适当的时机逐步实现自主品牌崛起与产业升级的宏大目标。

参考文献:

- [1] 范红忠. 有效需求规模假说、研发投入与国家自主创新能力[J]. 经济研究, 2007, (3) .
- [2] 郭晶、洪诗茜. 外部冲击与浙江省出口贸易——基于细分贸易方式和商品类别的实证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10, (6) .
- [3] 洪联英、刘解龙. 论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转型的战略性调整——基于微观企业层次的分析[J]. 国际经贸探索, 2009, (2) .
- [4] 李亚新、余明. 关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测算与应用研究[J]. 国际金融研究, 2002, (10) .
- [5] 廖涵. 论我国加工贸易中间品进口替代[J]. 管理世界, 2003, (1) .
- [6] 刘德学、苏桂富、卜国勤. 中国加工贸易升级对策研究——基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J]. 国际经贸探索, 2006, (4) .
- [7] 刘慧. 区域差异测度方法与评价[J]. 地理研究, 2006, (4) .
- [8] 刘志彪.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转型升级与对策思考[J]. 中国经济问题, 2010, (1) .
- [9] 刘志彪、张杰. 全球代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俘获型网络的形成、突破与对策——基于 GVC 与 NVC 的比较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07, (5) .
- [10] 刘志彪、张杰: 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 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思考[J]. 学术月刊, 2009, (9) .
- [11] 刘志彪、张少军. 中国地区差距及其纠偏——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视角[J]. 学术月刊, 2008, (5) .
- [12] 隆国强. 加工贸易发展问题研究[J]. 国际贸易, 2006, (9) .
- [13] 罗建兵. 加工贸易产业升级与国内价值链构建[J]. 当代财经, 2010, (2) .
- [14] 潘悦. 在全球化产业链条中加速升级换代——我国加工贸易的产业升级状况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02, (6) .
- [15] 裴长洪. 正确认识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J]. 国际贸易, 2008, (4) .
- [16] 邱斌、尹威. 中国制造业出口是否存在本土市场效应[J]. 世界经济, 2010, (7) .
- [17] 孙楚仁、沈玉良、赵红军. 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估计[J]. 世界经济研究, 2006, (7) .
- [18] 王子先、杨正位、宋刚. 促进落地生根——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J]. 国际贸易, 2004, (2) .
- [19] 许南、李建军. 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分析——基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J]. 财贸经济, 2010, (4) .
- [20] 闫国庆、孙琪、仲鸿生等. 我国加工贸易战略转型及政策调整[J]. 经济研究, 2009, (5) .
- [21] 章艳红. 外部需求冲击对中国出口的影响[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9, (1) .
- [22] 张蕴如. 加工贸易与开放式产业结构升级探析[J]. 国际经贸探索, 2001, (3) .
- [23] 朱启荣. 我国加工贸易对一般贸易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J]. 山东工商学院学报, 2007, (5) .
- [24] Ales, Alberto and Edward Glaeser. Evidence on Growth, Increasing Returns and the Extent of the Marke[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114(3): 1025-1045.

- [25] Alesina, Alberto Enrico Spolaore, Romain Wacziarg. Trade, Growth and the Size of Countries[A], In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Durlauf (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C], North-Holland, also see in www.stanford.edu, 2004.
- [26] Carr David L., James R. Markusen, and Keith E. Maskus. Estimating the Knowledge-Capital Model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3): 693-708.
- [27] Krugman, P.,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70: 950-959.
- [28] Porter, M. 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 [29] Schmitz, H. Local Upgrading in Global Chains: Recent Findings[C]. *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DRUID Summer Conference*, 2004.

Domestic Market Demand, National Value Chain, and Transition & Upgrading of Processing Trade——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n China's Economic Data from 1981 to 2008

Yu-wei Du

(Center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Jiangsu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In the post-financial crisis era, the transformation of export growth by relying on domestic market demand is crucial to the transition & upgrading of processing trade in China. From the national value chain perspective, the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effect of domestic market demand on different patterns of exports by using China's macroeconomic data from 1981 to 2008.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rket demand, such as the large domestic market scale, high-end market capacity, un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levels, are conducive to building the national value chain and transforming trade patterns in China; especially, the domestic high-end market capacity is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Moreover, the path of transition & upgrading of processing trade in China is also comprehensively influenced by international market conditions, fluctuation in exchange rates, as well as the national opening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Key words: domestic market demand; global value chain; national value chain; processing trade; transition & upgrading